

编者按

多年来,主流媒体对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困境、主体性以及所受到的关爱,给予了重点关注和全面、持续的报道,通过恰当的报道视角、真实的现象记录,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并引起全社会和各级政府对留守妇女及相关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催生了针对留守妇女的关爱和帮扶政策,促进了留守妇女生存状态的改善和留守妇女的发展。

留守妇女,在关注中成长的『弱势群体』

——主流媒体有关留守妇女报道的回眸与探析

■ 史玉根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妇女人口与日俱增,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照顾小孩、赡养老人等责任。

作为农村生产劳动的主力军和相对弱勢的群体,留守妇女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并受到关注,大致始于2005年。此后十多年里,主流媒体特别是与女性、三农相关主流媒体,一直把留守妇女作为关注的重点,对她们生存困境、主体行为以及受到的关爱等,进行了全面、持续报道,充分体现出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与担当,以及极强的新闻专业精神,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如今,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在相关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早已得到了改善,她们在生产经营、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原来不为大众所知的弱勢群体,之所以很快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各级政府的重视,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主流媒体的持续报道功不可没。

深入报道,呈现留守妇女生存困境

呈现弱勢群体的生存困境,体现新闻媒体的责任与担当。中国知网收录的资料显示,从2005年起,新闻媒体就开始重点报道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至2012年共发表了77篇以反映留守妇女生存困境为重点的报道,其中,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等几家主流媒体发表了41篇,占一半以上。

这类报道,有些是反映留守妇女群体生存困境,如《中国五千万农村留守妇女的艰辛与期盼》(《新华每日电讯》)、《留守妇女生存状况堪忧》(《中国妇女报》)、《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现状堪忧》(《农民日报》);有些是重点反映某地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如《边远山区农村留守家庭亟待关注》(《人民日报》)、《甘肃省农村留守妇女:急需关注的特殊群体》(《中国妇女报》)、《毕岭村的留守女人》(《农民日报》)。

报道反映的留守妇女的困难各有侧重,有的主要揭示留守妇女家庭婚姻的矛盾,如《从农村离婚案看留守妇女婚姻状况》(《中国妇女报》)、《一年见一次,“男工女耕”婚姻堪忧》(《农民日报》);有些主要表现她们的精神压力和情感困惑,如《留守妇女最难受的是“心里空落落”》(《新华每日电讯》)、《留守人群,孤独守望》(《农民日报》);有些主要描述她们在人身安全方面受到的困扰,如《农村留守妇女频遭侵害》(《法制日报》)、《遭遇性侵害的留守妇女为何沉默?》(《中国妇女报》)。

这些报道既有面上的调查数据,又有记者实地采访的个案。点面结合,呈现了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多方面的困境和难题,比如,家庭负担重、精神压力大、劳动强度大、缺乏安全感等。留守妇女生存困境的出现,涉及一些社会性问题,主流媒体没有回避,而是以较大篇幅和充足的版面给予报道和挖掘。一些深度调查报道长达数千字,占据了报纸三分之二版甚至整个版面。

主流媒体对留守妇女生存困境的持续报道,体现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这方面的报道不仅让公众对留守妇女有了更多了解,而且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催生了许多针对留守妇女的关爱和帮扶政策。

重点报道,展现留守妇女主体性

媒体是公众了解外在世界的窗口,但某些刻板印象也经由此途径形成。新闻媒体对留守妇女的生存困境进行持续和

显著报道,有可能使公众对她们形成“弱勢”“可怜”等负面印象,忽略了她们主体性,这显然不利于留守妇女的发展。主流媒体在这方面把控比较得当,在持续报道留守妇女过程中,通过恰当的报道视角和真实的现象记录,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中国知网收录的资料显示,从2008年开始,主流媒体对留守妇女主体行为的报道逐年增多。这方面的报道,既有群体行为的描述,如《柔肩挑重担》(人民日报)、《她们顶起整个天》(中国妇女报),也有个体人物特写,如《守土在家,她承担起双份责任》(中国妇女报)、《留守妇女吴玉华的“南瓜革命”》(中国妇女报);更多的是展现各地留守妇女在生产经营和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为,如《留守妇女争当“科技媳妇”》(人民日报)、《江西乐安留守妇女念致富经》(中国妇女报)、《铜山留守妇女成农忙主力军》(农民日报),等等。

这些报道呈现了留守妇女积极的正面形象:她们互帮互助、抱团取暖;她们刻苦学习,获取新知识、新技术;她们大胆创新,不断进取,尝试新产业;她们辛勤劳动,但也会享受生活。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留守妇女是基本吻合的。她们虽然整体呈弱勢,并不意味着她们都是弱者,相反,大多数留守妇女都是生活的强者,她们主动作为,通过自身努力改善了自己的生存状态。

留守妇女主体行为故事,也许不为某些大众媒体所青睐,但主流媒体给予了持续、重点报道。这些报道不仅有助于公众全面了解、认同留守妇女群体,而且还能激发更多留守妇女的自信心。

全面报道,反映留守妇女受关爱

留守妇女始终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人群,也是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的报道内容。笔者在中国知网搜检统计,从2011年开始,也就是在有关留守妇女困境的报道减少的同时,主流媒体特别是像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等相关主流媒体,以留守妇女受关爱为主题的报道逐渐增多,并持续至今。

这类报道,有些是报道政府部门、妇联出台关爱留守妇女的政策和措施,如《全国妇联扎实推进留守妇女儿童关爱行动》(人民日报)、《民政部等13部门出台意见 加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中国妇女报)、有些是写各级政府、妇联组织以及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出手帮助留守妇女解决实际困难,如《宁夏妇联开展阳光帮带行动,让留守妇女有支撑有帮衬》(人民日报)、《河南帮助近8万妇女找到新工作》(中国妇女报)、《“互助组”撑起留守妇女“整片天”》(农民日报)等。

通过分析此类报道的文本,笔者发现,对留守妇女受关爱的新闻,主流媒体都是根据其新闻价值的高低进行处理的。比如,国家出台的关爱留守妇女的新政策,一些地方关爱留守妇女工作的新思路和新做法,对各地开展相关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这方面的报道多见于重要版面;而一些地方的比较普通的关爱工作,虽然也传达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但新闻价值稍低,相关报道多见于非重要版面,篇幅也较小。这样的处理体现了主流媒体采编人员的新闻专业精神。

如今,留守妇女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依然存在不少困难,需要社会给予关爱。主流媒体应进一步做好对留守妇女的报道工作,新闻工作者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讲话精神,“转变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引导并激励这支农村社会主力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巾帼力量。

照见女性『为自己而活』的犹疑与徘徊

——由电影《我的姐姐》引发的思考

· 阅读提示 ·

近期热映的电影《我的姐姐》探讨了女性在自我的理想生活和家庭责任间的矛盾,引发诸多思考。作为女性视角的影视作品,《我的姐姐》不同于流行的“大女主”爽文,在其中,观众可以看到女性追求自我发展的美好品质,透视出代际更替下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也能体察到女性“为自己而活”的理想面临结构性保障缺失的困境,其女性视角和现实指向值得文艺创作者们深刻思考。



■ 刘洁

近期,电影《我的姐姐》热映,影片探讨了女性在自我的理想生活和家庭责任间的矛盾,引发诸多思考。

艰难的抉择:奉行“母职”抑或遵从自我

母职是有关做母亲的规范,生活中每个女性都被期待成为母亲,这就带来了女性是奉行母职还是遵从自我实现的冲突。在做母亲这件事情上,绝大多数女性都要被规训。“长姐如母”,在电影中,安然也被强加了这样的母职期待。母职对女性的异化在安然与弟弟的矛盾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安然的世界中,她会拒绝那个要当做儿子一般抚养的弟弟,因为“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

另一方面,母职不仅仅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它镶嵌在女性的关系网络中,同女性的各个角色都有交集。所以,安然既是被赋予母亲角色期待的“姐姐”,也通过侄女和外甥女的身份来重构其母职。

“成为女性”背后的不适与徘徊

“重男轻女”的性别不公现象至今仍不止息,广泛存在于父母子女之间、姐弟兄妹之间。女性总是被教育要牺牲、顾家,而她自己的欲念、诉求和权利却不断地被无视乃至扭曲。这才有了影片中“你都生两个女儿了,为什么还要生啊,儿子就那么好吗?”的控诉,有了安然对姑妈人生轨迹的不解,“我的姑妈,她永远在张罗,眼里装着每个人,唯独没有自己,她快乐吗?”

对女性的道德绑架使她们迷失在外在的标准和评价中,失却了本真,当女性要“为自己而活”,父权制伦理就会跳出来,逼迫女性去自责。所以在影片中,即使敏感如安然,也会发出如下喟叹:“我那么努力地生活,是希望有一天,站到爸爸妈妈面前的时候,你们能说一句,我女儿还是不错的”;同时在影片外,电影名《我的姐姐》所暗示的女性之依附性身份,也引起了人们的不适。

我们总说女性是关系的动物,她重视同他人的联系,善于人际交往,强调团结和凝聚。但为什么女性会有如是表现呢?在性别本质主义横行的时空语境下,与其说女性天性如此,不如说这是一种等级制的统治策略,因此安然的姑妈为别人付出一辈子,虽“无怨无悔”,也会为差别化对待下的不公和失落而泪下,并终于明白“其实套娃也并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在父权制下,对女性来说,“关系”不是流动的,而是僵化的实体,将女性固定在从属地位,所以才有了影片中姐弟不同生活间的张力。

个体化时代女性“为自己而活”的挑战

贝克将女性在个体化时代的生存境遇概括为从“为他人而活”到迈向“一点属于自己

己的生活”。这样的转变对应于电影中安然和姑妈的不同选择,“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的“一点”二字精妙地传递出了女性改变之艰之难。对此我们要问的是,变化为何如此不易?

这与伴随女性主体意识萌芽的主体性撕裂有关。影片中,姑妈虽然被迫一次次做出退让,但她能够逆来顺受,自我消化;而当安然想要追逐自己的生活时,却面临着他人的阻挠,在物质支持和心理建构方面都遭遇困境。父权思维拖拽住女性前进的步伐,导致了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的犹疑与徘徊。

此外,这还与他我界限重构的现实有关。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是自我主张与社会团结的平衡。但要做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被规训了太多太久的女性而言十分艰巨。影片的开放式结尾表明,在自我和他人的跷跷板上,安然没有最优解。因为在个体化时代,女性的义务究竟是自觉、自愿与自主,还是父权制规训下的阴影,往往难以判断。安然的故事道出了女性在个体化实践中所遭遇的阵痛。

在由性别、伦理和辈分所建构的家庭秩序中,姐姐是母亲的预备和后援,她一方面是家庭维系所依赖的成员,一方面也蕴藏着分裂家庭的可能——通过出嫁和独立的方式。针对出嫁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发展出了女儿是“外人”的文化观点;针对独立带来的对家庭团结的破坏,如同安然的遭际那样,则形成了定义其反社会化的指摘。在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马赛克家庭主义”中,女性的经历犹如走钢丝一般,摇摆的她们更需要社会性的支持。

作为女性视角的作品,《我的姐姐》不同于市场上流行的“大女主”爽文。在后者中,女主人公往往只是迎合了女性对倒转性别刻板印象的简单而粗暴的渴望,沉迷于成为霸权男性气质的代言人,或满足父权制的期待,与其说世界围绕着她转,不如说她始终围绕着自己转。这样的作品无疑失却了反思的品格。

相比于现实事例,电影结尾处理得柔和了许多,就此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有锋芒的作品,而不是隔靴搔痒、大而无当的快销品。性别多元话语不是彻底的相对主义,热衷于再造“圣母”,却打着女性解放的旗号行消费女性之实的作品只会蚕食掉进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姐姐》的女性视角和现实指向值得文艺创作者们深刻思考。

从年初的“李焕英”到“安然”,在聚焦女性的电影叙事中,看到的是女性一以贯之的美好品质,更有代际更替下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也看到个体化时代,女性“为自己而活”依然缺少结构性保障的困境……这些女性视角的作品引发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反思维思考,是一个值得深耕的领域。

(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